



□肖复兴

儿时住的大院后院的一排北屋后,有一条夹道。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,有这样夹道的并不多见,都是有讲究的。这是因为四合院一般都是坐南朝北,这条夹道可以阻挡冬天北风的袭来。我们院这条窄长的夹道里,种着两棵桑树,这就不仅没什么讲究,而且有些二八月乱穿衣了,因为一般认为桑树和松树都是坟地里的树,在四合院里种这样的树不吉利。不知道我们大院最初的主要为什么选择了桑树。

我小时候,这两棵桑树长得已经很粗壮了,高出后墙一截子。如果从外面看,枝叶葱茏,完全看不见大院里面的样子。每年到谷雨前后,桑树结果,这两棵桑树,一棵结白桑葚,一棵结紫桑葚,猜想是当年房主特意的选择。每年这时候,大院里的孩子常爬到桑树上采桑葚吃。其实,这玩意儿说甜不甜,说酸不酸,不怎么好吃,而且,桑葚很软,皮又薄,特别是紫桑葚的汁紫乎乎的,常常会弄得一手一脸全是,甚至会沾染在衣裳上,回家必定挨骂。

但是,我还是爱去后院夹道去采桑葚。吃是次要的,主要的是采桑葚过程的乐趣很大,很有吸引力。到夹道去,必须翻过后院北房,但总不能蹬着人家的窗户直接上房吧?必得从房屋旁边的山墙上去,山墙紧连着大院的厕所,厕所比北房矮,为我们提供了上房的方便。我们一帮小孩子便从厕所的木门上爬过去,先爬上厕所的房顶,再顺着山墙爬上北房的房顶,然后翻进夹道。这需要点儿功夫,虽然不必有燕子李三那样飞檐走壁的能耐,爬门的时候,得用点儿巧劲,才能一下子蹿上去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,厕所的门并不矮呢。从高高的房顶跳到桑树上,更得需要点儿功夫,而且需要点儿胆量。因为要够着桑树靠近房顶的枝桠,紧紧抱着它,借着它回弹的劲儿,像荡秋千似的,一下子悠到树上,有点惊险刺激的劲头儿。

那时候,北房的主人姓蒋,一位和蔼的老爷子。任凭我们这些孩子到他屋后夹道的两棵桑树上折腾,从不呵斥我们。采桑葚的日子里,会弄得我们身上脸上手上都是紫色,也会弄得院子里一地斑斑点点,紫乎乎的,家长骂我们说像是拉了一地鸡屎似的。

采桑葚的时候,常会碰见月玲。她和我一般大,小学同年级,但个子长得比我高,胆子比男孩

子大,是大院有名的疯丫头。她经常在桑树上一边吃桑葚一边嘲笑我,不断地朝我挑衅:敢不敢往树尖上爬?说着,她像只小狸猫似的,噌噌地爬上去,摇晃着树尖的枝子,接着朝我挑衅。从树上下来的时候,我会往她的身上冷不防地抹一把紫桑葚,弄紫她的衣服,然后呼呼地跑走。

少年不知愁滋味,吃凉不管酸。在上房、爬树、采桑葚的过程中,多有几分欢乐。童年短暂一瞬,像一阵风远去,小学、中学,一晃而过。我们的父母先后去世,大院的孩子渐渐变老,也都陆续搬出大院,风流云散。2004年,我写《蓝调城南》时,重访老院,老院正面临拆迁,一片狼藉,破旧不堪。空荡荡的大院里,所剩无几的老街坊中,月玲一家竟然还在。结婚之后,她一直住在她父母的老屋。我走进那两间熟悉的老屋,月玲不在家,她老公在。我没有见过她老公,那是头一次见,他对我显得非常热情亲切,连说早听说过你,月玲常说起你。我问,月玲呢?他告诉我,月玲在工厂早就退休了,一直在一家公司给人家当出纳。亏了她学过财会,家里的进项还能多点儿。他又告诉我,他们老两口一直坚持在大院没走,是在和开发商谈条件,希望能多要一间住房,给儿子住。他们的孙子也到了快结婚的年龄,房子成了老大难问题。

最后,他对我说:你没听说有句顺口溜吗?现在年轻人结婚,得是有车有房、父母双亡。我们没车没房,还好死不如赖活着,不成了他们的累赘吗?

看他说得分外伤感,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,跟着他一起叹气。我要告辞的时候,月玲下班回来了,进门一眼认出我,高声叫着我的名字,上前拉着我的手,说什么不让我走,非要留我吃晚饭。我说,等你们分了新房,搬到新家,咱们再吃饭,一起好好庆祝庆祝!

月玲不施粉黛,变得苍老了,只是个头还是那么高,如果从背后看,还显得亭亭玉立,年轻时的影子没有完全被岁月涂抹掉。她送我走出老屋时,我让她陪我去后院看看,她问我:看什么?还有什么可看的?我说看看那两棵老桑树,她一摆手:早就被砍掉了,还老桑树呢!但是,我们还是一起走到后院,蒋家的北房还在,人去屋空,门前凋零;厕所早就没了,盖起了小房,连后面的夹道也都变成了拥挤的房子。小时候我们一起上房爬树采桑葚的情景,恍然如梦。

大前年的夏天,旧地重游,我又回了一趟老院。月玲家还没有搬家,还在等待拆迁。但她家的房门紧锁,我问了另一户没走的老街坊,月玲两口子到哪儿去了?大约什么时候回来?街坊只说月玲的老公搬走和儿子一起住了。我问,月玲呢?街坊反问我:你不知道吗?月玲都走了好几年了!我十分惊讶,忙问:什么病呀?我上次来看她身体还好的呢!

今年谷雨前两天,家人买了一盒新上市的紫桑葚。我已经好几十年没吃过桑葚了,现在吃起来,忽然觉得很好吃,还有些甜滋滋的味道,和童年吃的味道竟然完全不同。第二天,我用没有吃完的几颗桑葚作画,先在纸上涂抹上一层清水,然后用桑葚做笔,紫紫的颜色,涂抹在纸上,在水的作用下变得深浅不一,渐渐变成了紫色的藤萝架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老院的那两棵老桑树,想起了月玲。



□孙葆元

电视剧《清平乐》把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北宋,宋仁宗赵祯再一次被戏说。他第一次被戏说是作为“狸猫太子”在乾隆五年的《忠烈侠义传》中,连清代学者俞樾都感觉那个戏说“殊涉不经”,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上演了二百年。从狸猫太子到狸猫皇帝,赵祯的民间角色定位在宫廷中,香阶罗裙,脂粉落花,让人不胜怜惜。以后讲他的故事,无非宫中的儿女情长。其实宋仁宗是一位有进取心的皇帝。《宋史》说他“天性仁孝,喜愠不形于色”。起码从外表上看,他是一位严肃的君主。

《宋史》载:“真宗第六子,母李宸妃也。”李宸并不是他母亲的姓名,而是封号。《宋史·后妃传》载,她是杭州人,在真宗赵恒朝,被选为“司寝”。对女人来说,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职务;对一个后宫的女人来说,这又是一个随时都能得到“宠幸”的职位。果不其然,赵恒把她纳入帐中。进入赵恒帐中的李氏晋升为才人,怀孕后又晋升为婉仪,她的儿子继位后,再晋升为顺容。她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能与自己亲生的儿子相见。

幼小的赵祯甫一出生就被刘氏皇后强行抱走,《后妃传》说她“以为己子”。刘皇后是太原人,“性警悟,晓书史,闻朝廷事,能记其本末。”可见她是真宗赵恒得力的私闱助手,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奏折,往往熬到中夜,这时候刘后多陪伴着他,所有奏折她都预先看过,每逢真宗问她,都能据实相告。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,踞后宫之首,力压三千粉黛。

赵祯投入刘后的怀抱,具体说应该是政治的怀抱。刘后并没有作为母亲的生理能力,而是把孩子交给杨淑妃抚养,她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母亲。这样,宫中三位高贵又美丽的女人就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了母亲、名义母亲和保姆的角色。

赵祯跟着刘后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他前面有五位皇兄,可惜先后夭折,他八岁上被立为太子,成为皇权的继承人。乾兴元年(1022年)二月,真宗赵恒去世。同年,十三岁的赵祯登基,成为仁宗皇帝。刘后也转换身份成为皇太后。史载:“太后保护帝既尽力,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。”这个时候,他的生母李氏晋升为宸妃。宋时后宫可设五位妃子,分别为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、宸妃。李氏是真宗朝最后一位妃子。然而政治命运主导着她的生活命运,升为宸妃的她被安排去陪伴丈夫真宗的陵寝,永远地离开了活人居住的皇宫。明道元年(1032年)李宸妃病逝,享年四十六岁。

这一段历史被戏说成宫廷中骨肉离散、母子两分的故事,可见后宫戏由来已久,并不是当代的创新。狸猫换太子是民间的解读,家道伦理,悲欢离合。然而皇家首先是政治家庭,执政是最高理念,诚如恩格斯所说,婚姻是政治的婚姻,赵祯与三个母亲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新闻了。先皇故去,刘太后亲自听政,教导少年皇帝,因为她是后宫一品,这是执政的需要,断没有让李宸妃听政的道理,朝廷理政不是母子过日子。当年就发生了一件事:赵祯下诏,先

皇殡葬“山陵诸费,毋赋于民”,既是说,所有殡葬用度不得向民众摊派。“蠲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田租”,免除殡仪占地所有民田地租税。这显然不是一个十三岁的皇帝所能做出的决定,决策者是帘幕后失夫的刘太后。

宋代是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,“人主之职论一相,一相之职论百官”(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》),颇有点民主政治的味道。刘太后的垂帘在当朝就非议不断,可是“人畏太后,亦无敢言者”。仁宗“犹不知为宸妃所出,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”,直到太后死去,燕王才告诉他真相,说:“陛下乃李宸妃所生,妃死于非命!”这句话极具挑动性,果然仁宗大恸,悲痛地数日不临朝,情感发生巨大裂变。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,告诉他,刘太后也是你的母亲,辛勤地教养你,此恩不可忘记。范仲淹在用国家的道理开导宋仁宗。

杨淑妃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,她悉心抚养幼小的仁宗,刘后很感激她,想授予她做禁军的侄子一个职务,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,让她在所有的司中选一个副职。没想到杨淑妃拒绝了,说:“小儿岂胜大恩,小官可也。”只给她的侄子更名为右侍禁。

三位伟大的母亲用各自的方式成就了宋仁宗四十七年的执政生涯,引导他走上人生香径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造成一份孤独,终生挥之不去。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跌宕,也看到社稷的跌宕。在治国的时候,他常常不“从私情”而“从公议”,这是当时的法治思想。《清波杂志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,嘉祐年间的一天,他与众嫔妃闲聊,后宫皆有等级,那些嫔妃都想擢升,于是撺掇皇帝开恩。“屡有干请,上答以无典故,朝廷不肯行。”仁宗说,朝廷没有这个规矩,即使我开恩,有司也不会批准的。妃子们不信:您是圣上,您说一句话,谁敢驳回?宋仁宗被纠缠得没办法,就坐下来“赐封”,一一写下封号。这些嫔妃们不是刘皇后,哪知朝廷的规矩?就高高兴兴地拿着皇帝批的条子去领俸禄。到了有司,人家不认。妃子们急了,就讲道理:这是皇上批的,白纸黑字,你们竟敢不认?有司说:皇上写的也不行,要从公议!“有司不敢用,悉退回。”妃子们讨了个好大的没趣。宋仁宗是按程序办事的,写个条子也不过是和妻妾们闹着玩罢了。所以,他的条子被驳回后,他感激地说,“其助我多矣!”

庆历三年(1043年),宋仁宗拜范仲淹主导发动了一场政治改革,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改革确立了十项方案,为:一、明黜陟;二、抑侥幸;三、精贡举;四、择官长;五、均公田;六、厚农桑;七、修武备;八、减徭役;九、覃恩信;十、重命令。其中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官长都是吏治改革的条款。庆历四年,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,有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,提出了为官的政治标准,不能不说与这次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。然而这次改革遭到大地主阶级和众多“抑侥幸”官员的抵制,不久就失败了。宋仁宗始终是孤独前行。